

白金图书奖

路内
《慈悲》

慈 悲

“可以是国家的,也可以是一个人,一只猫的”

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

5年前,路内来杭州参加悦读盛典,领取的是新人奖。他称自己那时年轻气盛,甚至有些狂妄,因为他在台上“放言”——几年后要回来领大奖。

5年后的今天,路内已入不惑之年,狠狠地在江湖漂过后,他果然如愿,在格非、金宇澄、王小妮、迟子建之后,成为年度春风白金图书奖得主。

这5年,他经历了很多,并且成为文学圈公认的“一线作家”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所有的经历都是写作的财富。“学刘伶,把苦酒和美酒全部痛饮下去。”是路内如今对人生与“活着”的理解。

人性之中有“慈悲”

钱报记者:评论家李敬泽不久前说到:张悦然、葛亮等70后、80后作家已成为一线作家。你觉得哪部作品是你闯进一线的转折点?

路内:一线作家这个说法,还是从文学界和读者的接受度来谈的,对作家本人,激励作用比较大,当然也有反作用。

一线是个现世的价值观。有些作家在世之时不为人知,死后被认可,有些一部作品登峰,有些是靠逐渐积累。我这个说法也好像有一种“文学史的焦虑感”,其实没那么夸张,写小说是件有趣的事,值得我一直做下去。

如果非要给出答案的话,《慈悲》可能是所谓的一线凭证吧,但作家要是总这么自我认证的话,意义不大。

钱报记者:今年的评委熊培云说,他看完《慈悲》很喜欢,尤其是结尾,当了和尚的弟弟出现,和侄子水生相遇又分别。有戏剧感,这样的收梢,是自然而然写出来的吗?

路内: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悖反,弟弟是个假和尚,他也觉得自己有悲悯心,是好事;水生和这个公司有仇,他说假庙是不能获得救赎的。这两个人的观念可以一直争执下去。

我一直觉得,普通人的人性之中都有“慈悲”这个因素,古代的儒道佛,近代的人道主义,甚至功利主义、丛林法则,都在正正反反地塑造人性。总的来说,这些想法都太大,需要熊培云、梁鸿这样的学者去分析,小说家给出的不太可能是答案。我对于生和死的问题,理解得始终还是浅薄。

《慈悲》来自父亲的讲述

钱报记者:我们第一届的时候,你以《云中人》获得年度新人奖,从新人奖到白金奖,正好用了5年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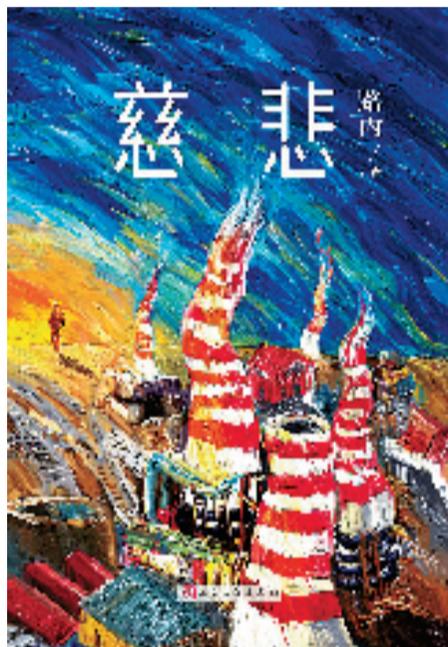
路内: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,站台上就说,过几年还要再来领奖,给人感觉狂妄了。

钱报记者:这5年,你经历了些什么?

路:我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,写了几部电影剧本,看上去自信满满。我还曾经宣称坐等瓶颈期到来,现在手头的长篇小说写了快两年还没过半,算是应验了。五年来的大部分经验都和写作有关,这不是好事。因为一直写长篇小说,写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,因为长篇是一个漫长的“局”,像走进镜子里,我能记得的是自己六次写完长篇时的心境,其他几乎都快忘记了。

钱报记者:从《少年巴比伦》到《慈悲》,你的风格有变化,好像有一种从“青春”走向“成熟”的东西。

路内:《慈悲》的风格确实和《少年巴比伦》不一样,这个问题或许和写作路径有关系。当年写完《少年巴比伦》以后,文学界我听到一种观点,认为这是所谓青春写作,但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,作品被贴上“青春写作”的标签,是不大



路内,1973年生于苏州,现居上海。著有《少年巴比伦》、《花街往事》、《慈悲》等,曾获2016年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、首届“茅盾文学新人奖”等。

好的一件事。在写《慈悲》的时候,我就想怎样在相对比较正统的文学环境下写作。

钱报记者:我看到评论家张莉说,“当我们还习惯性地认为这位写出《少年巴比伦》、《追随她的旅程》等长篇小说的作者将在残酷青春写作道路上一路飞奔时,路内写出了《慈悲》。”

路内:这是写作的一个必然过程吧,越写越大,越写越深。但我并不认为《少年巴比伦》是个简单的小说,它有着我难以控制的深刻和悖反,我现在看来,《少年巴比伦》很好,但瑕疵也有。《慈悲》,我觉得没有《少年巴比伦》好,但技术上瑕疵很少。《慈悲》是个很大的东西,可以是国家的,也可以是一个人,一只猫的(路内自己养了两只猫),表达的是最普通的生存观念,也可以是低水位的文化程度中仍可保持的一种善。《慈悲》主要的故事,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。

钱报记者:写《慈悲》到了“增一字都难的状

态”,我听说编辑想让你加字,但你就是加不出几个字了,这个我听起来,会有两个念头,一个是路内是不是有点矫情呀?另一个是路内的写作已经非常成熟。你自己的感觉呢?

路内:确实有点矫情哈。我的状态是这样的,小说写好一年内觉得改无可改,过了一年最好推翻重写。这都不太好,有点虚妄。至于说成熟度,有时是能力,有时也是运气,这个题材这个风格,又遇到这个作家正好自信满满能写能改,那就能表现得还可以。我们所说的成熟,有些指风格的定型,有些是指作品的调性,偏向娱乐型的作家也有他的成熟度可以考量,但对大作家就会用另一套学术的标准。谈到成熟,作家最好清醒一些。

写“工厂”是一个自然经验

钱报记者:很多人从《慈悲》联想到余华的《活着》。

路内:不太好意思和余华先生的作品做比较,公开讲这个更轻佻了。我觉得如果有相似度的话,首先是一种文学的传承,这和眼界、审美有关,其次是两部小说里的人物都带有江南一带的狡黠和温厚。

钱报记者: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?会继续以父亲和自己曾经的工厂经历为原料吗?

路内:还真都有。一是写了十年的短篇小说集《十七岁的轻骑兵》,写1990年代的技校和工厂子弟,今年希望能写完。一部短篇小说集写十年,我想自己也算是有诚意了。另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,其中写到血汗工厂。

不过,我倒一直没有给自己贴“工厂”的标签,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经验,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并不是每个写到爱情的作家都会被列为言情小说家。但我也并不高兴出来辩解,显得我好像特别急于要“转型”似的。也许还会写到我的父亲母亲,写到我的祖父,家族里的故事挺多的,但我也没有“家族叙事综合征”(这个是文学界的一种揶揄),看运气吧。

钱报记者:我知道最近一年来对你可谓悲喜交集,《少年巴比伦》公映,但是你父亲离你而去了,这一年也是你在写作上的丰收年,借用余华的书名,你觉得“活着”是什么?

路内:电影的事不想谈了,酒气财色,表面上看到改编公映很风光,其实给我提供了很暗黑的小说素材。将来我要是写中国的青年导演怎么上位,真能写出花来。

我父亲78岁,走了。不知道该说什么好,我经常坐着叹气。假如可以永远不作告别,那又何必写小说呢。我以前觉得文学荣誉是可以永生的,现在发现,永生是多么虚妄,不得安宁。时间必然流逝,人们必然要告别,所谓活着,到最后并没有神的光芒、文学的光芒环绕,到最后都是在黑暗中找到一线微光,能够安慰自己或者给人以安慰,应该满足了。或者开启另外一种模式,学刘伶,把苦酒和美酒全部痛饮下去。